

第三章 國際貿易因素分析

維持出口競爭力的匯率政策、將匯率政策當作維持出口競爭力的重要手段，是人民幣匯率政策選擇的重要因素，背後的意義在於獲取龐大的出口利益與外匯收入，而這又與中國轉型經濟中所出現的制度性與結構性制約有關。換言之，維持較高的經濟成長率與產業結構升級是解決目前中國包括失業率不斷上升、國營企業經營效益低落的重要途徑，而出口貿易的成長則是帶動中國經濟成長與結構調整的重要推動力量。

第一節 中國貿易政策取向

一、出口貿易競爭力

將穩定出口國際競爭力與進口成本作為人民幣匯率政策選擇的因素，主要是考慮到中國經濟成長的獨特模式，意即進出口貿易在中國經濟成長中處於至關重要的戰略地位。2002 年以來，進出口貿易總額佔 GDP 中的比重已經超過一半，進出口貿易對於中國的經濟成長與總體經濟穩定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目前正處於新一輪的工業化與產業升級階段，快速成長的原材料與機械設備進口滿足了中國國內新一輪工業化與產業升級的需要；快速成長的製成品出口則為進口提供了必需的外匯供給，巨額的對外貿易幫助中國實現了比較利益，大大地提高了中國經濟成長的效率(張斌與何帆，2005)。

鑒於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成長中的重要性，中國貨幣當局對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就必須考慮到穩定出口國際競爭力與進口成本，以避免人民幣匯率的大幅調整破壞其出口競爭力，或者是引起進口成本的急劇變動。穩定出口國際競爭力與進口成本的匯率政策選擇，在其他以出口導向為發展略的國家的匯

率調整過程中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在國際上，近年來有許多中小型開放經濟體在匯率政策選擇中引入了釘住通貨籃的匯率政策，其核心意義在於穩定其出口競爭力與進口成本，進而達到國際收支平衡與總體經濟穩定的目的。

匯率劇烈波動對任何國家都具有不利的影響，但是同樣幅度的匯率波動對不同國家造成的衝擊程度卻大不相同。為了實行外向型的出口導向貿易發展策略，中國貨幣當局在匯率政策的選擇上亦傾向以「穩中趨貶」的政策取向，其目的在於獲取出口競爭力與保護其國內產業，並藉此累積外匯存底。

從中國在 1980 年代以來的情況來看，中國採取匯率政策的實質目標方法，意即透過匯率持續小幅貶值或不定期階段性較大幅度調整，增強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以獲得出口成長，改善貿易收支和增加外匯存底。為了獲得合理的匯率水準，修正人民幣幣值的高估，中國曾採用貿易內部結算價、持續讓人民幣小幅度貶值、不定期階段性較大幅度的貶值，以及外匯調劑市場匯率等措施。

李婧(2004)指出，直到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前，中國的匯率政策是以實質目標為導向的，匯率政策目標是促進出口和獲得外匯，這種匯率制度在匯率安排上是浮動匯率制度。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和金融危機後，人民幣匯率政策從實質目標法轉向名目錨釘住，即事實上的單一釘住美元制，這是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巨大轉變。

事實上，回顧中國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可以看出其具有非常強烈的服務於貿易政策的取向，這是人民幣匯率政策的主要特徵(唐國興與徐劍剛，2003)。

1981-1985 年 9 月人民幣匯率持續小幅貶值，修正高估的人民幣幣值，目的是為了促進出口，平衡外匯收支。1985 年中國政府認識到要確定合理的人民幣匯率水準，1986 年 7 月至 1991 年 4 月 8 日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對人民幣匯率有四次調整。1989 年 12 月和 1991 年 11 月兩次較大幅度的貶值，是為了獲

得合理的人民幣匯率。1979 年 9 月、1984 年 9 月、1988 年 2 月、1990 年 12 月中國改革外貿體制，在外貿體制改革的配套措施中，人民幣匯率改革成爲一項重要的內容。例如，1985 年 1 月 1 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貿易內部結算價並軌，1988 年放開外匯調劑市場匯率，1991 年 4 月實行有管理的匯率政策，人民幣匯率政策的目的實際上是促進出口。

二、匯率穩定的支持

從中國 1980-90 年代五次大幅度的匯率貶值(超過 15%)與國際貿易的關係中(詳見表 3-1)，可以發現以下幾個現象(余維彬，2003)：

第一，人民幣大幅度貶值對中國出口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除了 1985 年外，人民幣四次大幅度貶值都使得當年出口成長率大幅提高。1984 年人民幣貶值 17.8%，出口成長率就從 1983 年的-0.1%上升爲 1984 年的 17.6%；1986 年人民幣貶值 17.6%，出口成長率就從 1985 年的 4.6%上升爲 1986 年的 13.0%；1990 年人民幣貶值 27.0%，出口成長率就從 1989 年的 10.6%上升爲 1990 年的 18.2%；1994 年人民幣大幅貶值 49.6%，出口成長率就從 1993 年的 8.0%上升爲 1994 年的 31.9%。

第二，1980 年代人民幣三次大幅度貶值對進口的抑制不明確。1984、1985 年人民幣分別貶值 17.8%和 26.2%，但當年進口成長率卻從 1983 年的 10.9%上升到 1984 年的 28.1%和 1985 年的 54.2%；1986 年人民幣貶值僅 17.6%，進口成長率卻從 1985 年的 54.2%下降爲 1986 年的 1.5%。1990 年代人民幣大幅貶值對進口的抑制還是相當明顯的，1990 年人民幣貶值 27.0%，進口成長率從 1989 年的 7.0%下降爲 1990 年的-9.8%；1994 年人民幣貶值 49.6%，進口成長率就從 1993 年的 29.0%下降爲 1994 年的 11.2%。

表 3-1 人民幣匯率變動與國際貿易變動情況(1980-2005 年)

單位：億美元

年份	匯率		出口總額		進口總額	
	RMB/USD	貶值(%)	出口額	成長率(%)	進口額	成長率(%)
1980	1.4984		181		200	
1981	1.7050	13.8	220	21.5	220	9.9
1982	1.8925	11.0	223	1.4	193	-12.5
1983	1.9757	4.4	222	-0.1	214	10.9
1984	2.3270	17.8	261	17.6	274	28.1
1985	2.9367	26.2	274	4.6	423	54.2
1986	3.4528	17.6	310	13.0	429	1.5
1987	3.7221	7.8	394	27.4	432	0.7
1988	3.7221	0.0	475	20.5	553	27.9
1989	3.7651	1.2	525	10.6	594	7.0
1990	4.7832	27.0	621	18.2	534	-9.8
1991	5.3234	11.3	718	15.7	638	19.6
1992	5.5146	3.6	849	18.2	806	26.3
1993	5.7620	4.5	917	8.0	1040	29.0
1994	8.6187	49.6	1210	31.9	1157	11.2
1995	8.3510	-0.5	1488	22.9	1321	14.2
1996	8.3142	-0.1	1511	1.5	1388	5.1
1997	8.2896	-0.3	1828	21.0	1424	2.5
1998	8.2791	-0.1	1837	0.1	1402	-1.5
1999	8.2796	0.0	1949	6.0	1657	18.3
2000	8.2784	0.0	2492	27.8	2251	35.8
2001	8.2770	0.0	2661	6.8	2436	8.2
2002	8.2770	0.0	3256	22.4	2952	21.2
2003	8.2770	0.0	4382	34.6	4128	39.8
2004	8.2768	0.0	5933	35.4	5612	35.9
2005	8.1100	-2.0	7620	28.4	6601	17.6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商務部。

第二節 產業結構的調整

一、貿易商品結構

中國進出口商品結構是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際貿易影響程度的決定因素，中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有以下特徵(詳見表 3-2)：

第一，中國 1980-2005 年的出口商品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初級產品佔出口總額的比重急劇下降，從 1980 年的 50.3% 下降到 2005 年的 6.4%；工業製品佔出口總額的比重急劇上升，從 1980 年的 49.7% 上升到 2005 年的 93.6%。

表 3-2 中國進出口商品結構(1980-2005 年)

單位：%

年份	出口商品結構		進口商品結構	
	初級產品佔出口 總額比重	工業製品佔出口 總額比重	初級產品佔進口 總額比重	工業製品佔進口 總額比重
1980	50.3	49.7	34.8	65.2
1981	46.7	53.3	36.5	63.5
1982	45.0	55.0	39.6	61.4
1983	43.3	54.7	27.2	72.8
1984	45.6	54.4	19.0	81.0
1985	50.6	49.4	12.5	87.5
1986	36.8	63.2	13.1	86.9
1987	33.5	66.5	16.0	84.0
1988	30.4	69.6	18.2	81.2
1989	28.7	71.3	19.9	80.1
1990	25.6	74.4	18.5	81.5
1991	22.5	77.5	17.0	83.0
1992	20.1	79.9	16.5	83.5
1993	18.2	81.8	13.7	83.3
1994	16.3	83.7	14.3	85.7
1995	14.4	85.6	18.5	81.5
1996	14.5	85.5	18.3	81.7
1997	13.1	86.9	20.1	79.9
1998	11.2	88.8	16.4	83.6
1999	10.2	90.8	16.2	83.8
2000	10.2	90.8	20.7	79.3
2001	9.9	90.1	18.8	81.2
2002	8.8	91.2	16.7	83.3
2003	7.9	92.1	17.6	82.4
2004	6.8	93.2	20.9	79.1
2005	6.4	93.6	22.4	77.6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與中國商務部網站公佈資料計算。

第二，中國 1980-2005 年的進口商品結構基本保持平穩。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工業製品的進口比重就一直穩定在 80% 左右，初級產品的進口比重穩定在 20% 左右。

以上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說明，中國出口成長主要是依靠工業製品出口得以實現的，中國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在不斷提高，因此從技術替代性角度可以得到中國出口的匯率彈性呈現下降趨勢的初步判斷。中國進口產品的結構保持相當的穩定，工業製品的比重相當高，這說明中國的進口一直是注重於進口國外先進的技術和設備，這些產品通常技術含量較高，產品替代性小，因此進口

的匯率彈性在一段時期內仍然會保持穩定狀態。在目前條件下，人民幣匯率的大幅變化對中國進出口的影響還是存在的；但從長期來看，由於中國出口產品技術含量的提高，人民幣匯率變動的影響將會遞減(余維彬，2003)。

二、產業結構調整

匯率政策作為全面性的調節工具，對中國優勢產業和劣勢產業都將產生重大影響，從而改變中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從中國貨幣當局的決策考量來看，目前中國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參與國際市場主要依靠價格優勢，如果輕率將人民幣升值，其他國家的產品將迅速取代中國產品，從而惡化中國的出口貿易。但是，若為了維持出口競爭力與保護其國內產業與就業，而選擇採取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政策，又將延緩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速度，從長期來看，對於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國營企業改革、企業國際競爭力提升與資源的有效配置將有不利的影響。王信與馬昀(2005)即指出，中國持續擴大的經常帳順差使得中國的資源過分向對外經濟部門集中，服務業等非貿易部門發展相對滯後。長期以來，中國透過稅收與匯率政策大力鼓勵出口，中國各地熱衷於發展出口加工業，因而忽視了其國內其他部門的發展，不利於中國對外經濟和國內經濟協調發展。這也是中國貨幣當局在選擇匯率制度時的考量因素。

以人民幣匯率低估為例，人民幣低估提高了中國貿易財部門產品(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的相對價格，但是壓低了非貿易財部門產品(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的相對價格，使得中國的經濟資源更多地流向貿易財部門。人民幣匯率低估導致的出口部門的成長，其實是以中國國內的非貿易財部門的發展受阻為代價的。中國三次產業的產值比例是 15：52：33，世界平均的比率是 5：31：64；中國三次產業的就業比率為 49：22：29，其他國家的普遍規律是第三產業就業是第二產業就業的 2~3 倍。這兩組數據的比較顯示，中國目前的第三產業還遠未發揮其潛力，它不僅應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做出更重要的貢獻，同時也是

未來中國就業最根本的保障(張斌與何帆，2005)。

第三節 貿易夥伴的壓力

一、日本的壓力

2002 年 12 月 2 日，日本副財相黑田東彥(Haruhiko Kuroda)及其副手河合正弘(Masahiro Kawai)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署名文章「全球性通貨再膨脹正當其時」(Time for a Switch to Global Reflation)；2002 年 2 月 22 日，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Masajuro Shiokawa)在 OECD 七國集團會議上向其他六國提交通過議案，要求逼迫人民幣升值。2003 年 3 月 2 日，日本經濟新聞發表文章稱「中國向亞洲國家輸出了通貨緊縮」。

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國向全球輸出了通貨緊縮。黑田東彥和河合正弘的文章具有代表性。他們在文章中強調了三個方面(轉引自覃東海與何帆，2004)：

第一，新興市場國家，主要指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進入國際貿易體系，產生了巨大的通貨緊縮壓力。由於新興市場國家的加入，國際市場上的供給能量擴大，導致工業化國家的物價急遽下跌，使得政府的財政壓力加大。而且，總需求下降對價格的進一步向下壓力，具有引發螺旋式通貨緊縮的危險。

第二，中國正在輸出通貨緊縮，而且這種影響不侷限在它的鄰國。由於出口急遽增長、國內的價格緊縮以及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中國正在向全世界輸出通貨緊縮。

第三，在應對全球性通貨緊縮方面，美國、歐洲、日本分別採取了各種形式的通貨再膨脹政策，現在也應該包括中國。中國是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有責任為穩定世界經濟做出貢獻，以符合其利益。如果中國政府不能嚴格限制出口，那麼為了扭轉國內通貨緊縮局勢，應該採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或者是讓

人民幣升值。

二、美國的壓力

2003 年 6 月和 7 月，美國財政部長史諾(John Snow)和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先後發表談話，希望人民幣選擇更具彈性的匯率政策，渠等認為釘住匯率政策會最終損害到中國經濟。其後，美國的商務部長、勞動部長也發表類似觀點，人民幣升值的真正壓力從日本轉向美國。美國的一些利益團體，以健全美元聯盟(Coalition for a Sound Dollar)為代表，在要求人民幣重估方面的表現最為積極，美國方面的情緒隨著史諾 2003 年 9 月訪問中國而達到高潮。

美國方面希望人民幣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國的貨幣操縱造成了美國嚴重的製造業失業問題(轉引自覃東海與何帆，2004)。其分析思路為：中國存在嚴重低估人民幣的貨幣操縱行為，從而使得中國的製造業贏得了巨大的競爭優勢，美國製造業發展出現萎縮，企業大量倒閉，帶來了嚴重的失業現象。從 2003 年 6 月開始，健全美元聯盟拋出了每月一期的「亞洲貨幣操縱監控報告」(Asian Currency Manipulation Monitor)。在其 6 月、7 月、8 月推出的報告中均強調，中國、日本、韓國和台灣存在嚴重的貨幣操縱行為，東亞地區的貨幣操縱構成了美國製造業失業的主要原因。

2003 年 7 月，美國參眾兩院議員代表聯合給財政部長史諾和布希總統寫信，他們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邏輯順序為(轉引自覃東海與何帆，2004)：首先，美國的失業率已經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到 2003 年 6 月美國的失業率已經達到了 6.4%，其中 90%的失業是製造業的失業；其次，美國的製造業失去了競爭優勢，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低廉，另一方面是人民幣的過度低估；第三，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從 1998 年的 570 億美元，已經擴大到了 2002 年的 1,030 億美元(此數據與中國官方有差異，詳見表 3-3)，過去幾年裡中國累積了世界上最多

的外匯存底，到 2003 年 6 月已經達到了 3,450 億美元；第四，中國需要為美國的經濟下滑和失業上升負責，美國政府必須給中國政府施加更大壓力。

表 3-3 中國對美國貿易概況(1997-2005 年)

單位：億美元

年份	進出口總額	出口總額	進口總額	進出口差額
1997	490	327	163	164
1998	549	380	170	210
1999	614	419	195	224
2000	745	521	224	297
2001	805	543	262	281
2002	972	699	272	427
2003	1263	925	339	586
2004	1696	1249	447	802
2005	2116	1629	487	1142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商務部。

美國國會對人民幣的不滿情緒於 2005 年春季達到了頂點。2005 年 4 月 16 日，來自紐約的民主黨參議員舒默(Charles Schumer)和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參議員葛拉漢(Lindsay Graham)，極力要求對美國國務院每年一次的開支法案通過修正案，提出如果北京不同意讓人民幣升值，就對所有中國進口商品課征 27.5%的懲罰性關稅。最後，美國參議院以 67 比 33 的投票結果，同意對修正案進行討論(轉引自華爾街日報，2005)。

三、中國的回應

儘管以美國為主的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升值施壓，但中國官方一直堅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政策。溫家寶在 2005 年 5 月中旬公開表示，「將堅定不移地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考慮宏觀經濟環境，考慮企業承受能力，考慮金融改革的進度，考慮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周小川亦指出，「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在政策上、技術上不存在障礙，但任何改革的時間表需

要不斷推敲」(轉引自高長，2005)。從中國當局的回應不難看出，中國當局並不排斥對人民幣的改革，問題在於中國領導人公開宣稱，人民幣匯率改革是中國的主權，每個國家完全有權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匯率政策，決不屈服外界壓力，顯然中國亦不願在貿易夥伴的壓力下，改變自己的原則和既定的人民幣匯率政策(高長，2005)。中國官方所持理由包括以下四者(邱宏輝，2005；王智勇，2005；林祖嘉，2005)：

第一，中國的經濟發展水準低，經濟結構失衡，不允許人民幣大幅升值。中國官方認為，目前中國人均 GDP 仍屬於低所得國家水準，出口勞力密集型產品比較高，經濟結構不合理，就業壓力大，東中西部地區發展水準差距相當大，農民仍在口中佔 60% 以上，人民幣升值將削弱中國勞動力的相對優勢，不利於就業和社會穩定。若人民幣升值 10%，一年後將使中國 GDP 成長率下降 1%，對就業的負面影響相當顯著，由此將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繼續保持穩定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將有利於降低不確定性，為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有利於降低交易成本，促進中國企業對外貿易的發展。

第二，中美貿易逆差並非匯率單一因素所致。在中美貿易問題方面，美國政府與相關利益團體認為，中國對美國保持較大的貿易順差是人民幣低估的緣故，並試圖透過對人民幣施加升值壓力來緩解其國內經濟失衡。但是，中國官方認為，實際上造成美國對中國巨額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兩國經濟結構不同和生產成本的差異，人民幣匯率並不是關鍵因素。即使人民幣升值，中美貿易逆差有可能會有所減少，但美國對東南亞等國家的貿易逆差也會加大。此外，中國貿易順差的相當部份係以證券投資的方式回流到美國，對於美國維持低利率、平衡財政赤字與穩定匯率均有助益，如果人民幣升值，同樣也會不利於美國經濟金融的穩定。

第三，外資企業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佔有越來越大的比重。據中國商務部統

計，截止 2002 年外資企業中 15% 是美、日企業，另外還有大量的美、日企業透過香港、維京群島等地間接進入中國。因此，中國對外貿易的迅速成長，以美國、日本爲首的外資企業獲取了相當的利益。要求人民幣升值不僅無助於一些國家的經濟狀況的改觀，還會損害這些國家在中國企業的利益。人民幣升值將降低外資企業的利潤率，從而引起長期直接投資的逆轉，損害中國經濟的健全發展。日本貿易振興會對 1,300 多家在中國的日本企業的調查顯示，50% 以上的日本企業主要業務在出口方面，如果人民幣升值，他們將首當其衝地受到影響，絕大部分日本企業不希望人民幣升值。此外，雖然中國出口成長快速，但其中有相當部份是由其他國家的轉出口所帶動的(例如台灣與香港)，因此不應該將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全部算在中國身上。

第四，中國出口商品中的進口比重很大。人民幣升值雖然會降低出口競爭力，但由於在升值下進口成本也降低，因此又會增加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因此升值所帶來的邊際效果不會太大。況且中國目前出口商品中，有超過一半以上是由外資企業(包括台商)所生產，這些外商產品所使用的原物料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系來自海外，而人民幣升值會使這些原物料或半成品的價格下跌，因此可以增加中國商品的競爭力。換言之，人民幣升值對於中國商品出口的負面影響並不如想像中的大。

在 1997-2005 年期間，中國貨幣當局選擇採取人民幣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與中國出口導向的對外貿易政策與中國對外經濟中的重商主義有關，這種政策思維使得中國政府懼怕浮動匯率，因而使得人民幣匯率遲遲不能浮動。人民幣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對中國實質經濟部門的調節帶來不利的影響，增加了實質經濟部門的調節壓力。

這種可調整的釘住或是軟釘住匯率政策，在中國資本管制有效的情況下是

可以暫時維持的，在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結構沒有改變的情況下，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政策可能還要走更遠的路。從長遠來看，在中國金融帳開放逐步走向開放的情況下，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是改善目前的進出口貿易結構，增強產業的競爭力與應變力，而這也正是中國貨幣當局在考慮讓人民幣由固定釘住走向管理浮動的重要因素。

從國際貿易因素的角度來看，維持較高的經濟成長率是解決目前中國包括失業率不斷上升、國營企業經營效益低落的重要途徑。出口貿易的增長則是帶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倘使人民幣匯率升值，將使得中國出口商品競爭力減弱，勢將影響中國的經濟成長率，並增加失業問題所帶來的壓力(魏艾，2005)。